



李长声：中日之间的误解与错位



作家李长声先生被誉为“文化知日第一人”，他的文字延续了黄遵宪、周作人以来的“知日”传统，不但有知识、有见识，更有态度，为读者“知日”带来新意。

他推崇随笔，认为日本文学传统就在随笔，哪怕是《源氏物语》，本质上仍是随笔性的叙述；他更认为，随笔是日本文化得以建立自身审美的关键。在本周开幕的香港书展上，李长声会以“村上春树如果不进京，可能不会写小说”为题做讲座。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长声先生，请他结合旅日30年的经验阐述对日本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的认识。

□本报记者 李师胜



>> 我最佩服日本人的持之以恒

齐鲁晚报：7世纪“白村江”之战后，日本潜心学唐多次派出“遣唐使”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日本对中国研究远远超过中国对日本的研究，但您在著作中指出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并不少，为什么这样说？

李长声：首先，日本对中国研究较深，甚至很深，这是事实，但事实的背后有原因。日本对中国研究可以分作两部分，一是对历史的研究，二是为侵略的研究。关于日本的文字记录，最早的是我们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他们自己的记录《古事记》是几百年以后了。起码自秦汉以来，日本持之以恒地拿来中国文化，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他们自己。当日本要侵略掠夺中国时，当然要认真学习、深入、仔细地研究中国，连哪里有个小煤田都知道。除了元朝，出兵过日本，此外中国从来不曾想侵略它；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国，也用不着跟它学。后来它打败了中国，中国人很快就向它学习，反倒是它又进犯中国，打断了我们的学习。如果不算台湾，那么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开始学习日本了。但是它当惯了学生，有学生的小心眼，不会好好教。

最早研究日本的，就是中国人，比他们自己都早。唐人就有诗，说日本人“野情偏得礼，木性本含真”，现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。唐书中也说他们“不以实对”，这始终是他们的民族性，如今叫“暧昧”了。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也到斯德哥尔摩讲这一点。美国《菊与刀》对日本人的认识，特别是关于两面性，并没有超越戴季陶、周作人，只是换了西方的角度，多了些文化人类学的说法罢了。

齐鲁晚报：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“同文同种”，但事实远非这句话所能概括。以您在日本生活30年的感受来说，中日国民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

李长声：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雨，况且隔着海，两国的人不同是正常的，同才不正常。不过，同是人，同样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，所以大同小异，不必把不同看得多么不得了，好像活在小说中一样。

我最佩服的是日本人的持之以恒。报刊上连载小说或漫画，连载几年，十几年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因为有恒，才能有细节。我们说卧薪尝胆，只是个成语，打比方而已，他们却践行。电视上看见小泉、安倍在美国人面前一副孙子样，但我知道那是在卧薪尝胆。

齐鲁晚报：中国人做事也讲究

认真，可经常大而化之，“差不多”就行。日本是另一个极端，凡事讲究“精细”，比如茶艺、茶花，有把所有的东西“缩小”的倾向。造成中日之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？

李长声：日本作家开高健曾遗憾日本没拿来中国的“马马虎虎”这个词。这也是自然环境造成的。中国大，民族多，都精细起来，可丁可卯，就无法大团结了。日本起初也要学中国的大，例如仿造长安城，例如奈良的大佛，但会把从中国拿来的文化改造、发展成日本文化，你大而化之，我就缩小，精雕细琢。

齐鲁晚报：目前，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，部分游客素质不高，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您认为，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哪些误解？国人到日本旅游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？

李长声：日本人也未免过分，既想挣人家的钱，还要一切按他的规矩办。国人要注意“场合”二字，有的场合，例如在酒馆里喝酒，大声说话也无妨，可能日本人的声音更大，但有的场合不可以，例如咖啡馆，大声说话招人烦。中国人以不守规矩为能事，再加上人前显贵，给哪里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不过，素质会一点点提高的。

>> 日本人的矛盾性被特别强调了

齐鲁晚报：说到日本、日本文化，很难绕开《菊与刀》，日本人本身具有矛盾性。其实性格矛盾在每个国家国民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，但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。造成日本人性格矛盾的原因是什么？

李长声：也未必日本人表现得特别明显，而是被特别强调了。中国人向来说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。中国的谚语都有正反两个，互相打脸，但中国人运用自如。至于原因，读读《矛盾论》吧。

齐鲁晚报：日本小说家石田衣良说，“日本要是没有了，世界上遗憾的也就是失去漫画和电子游戏罢了。”日本漫画兴盛的原因为何？您有没有建设性意见，有关中国能从日本漫画借鉴哪些元素？

李长声：日本文化本来具有漫画性。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漫画，好像也喜欢美国电影，可能是因为人家的东西具有先进性。那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出落后的原因。中国也在拼命搞这些，有一种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心理。各国各国的文化，各有长处。中国在世界中，不可能把世界搬进中国来。日本漫画之所以被

喜欢，因为它是日本的。喜欢日本漫画就看原装的日本漫画，喜欢中餐就吃地地道道的中餐。进日本书店看看，漫画铺天盖地，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选出来的，不过是冰山一角，真所谓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这样才能把漫画发展起来。

齐鲁晚报：同样是酒局，在日本和中国大有不同，在您主编的《中日之间：误解与错位》中对日本的“酒会”进行了解释，这与中国请客吃饭有何不同？

李长声：中国叫饭局，目的是吃，吃菜。出门之前老婆嘱咐多吃少喝。日本叫饮会，目的是喝，即使不能喝酒，也会要一杯饮料凑趣。饭局也好，饮会也好，是一种交际，这一点哪里都一样。最大的不同好像是对于醉酒，日本比较宽容，虽然也大不如前了。中国人爱劝酒，把人家灌醉，却又说贪杯，最典型的矛盾性。

齐鲁晚报：日本人很懂礼貌，鞠躬时腰弯成90度，见面很客气。日本人在内心果真如此吗？会不会腹黑？

李长声：我们见面也客气，只不过不鞠躬。鞠躬比握手好，过去曾搞

过预防肝炎互不握手。抱拳或作揖也很好，省得挨个握手。握手是无聊的西方文明之一。礼貌本来是外表，是形式，用不着内心，所以外交场合要加上“诚挚”之类的说辞。

齐鲁晚报：佛教入日几经兴废，如今佛寺众多，信徒占人口八成；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极力推崇神道教。目前佛寺和神道杂糅，您认为佛教和神道教哪个对日本人的生活影响大？

李长声：对生活的影响以佛教为大。明治维新推崇神道，立为国教，主要在精神方面，如忠君，这很容易变。日本的佛教不但是宗教，而且是文化，是生活。例如，茶就是和尚从中国带回日本的，从寺庙传到民间，又发展出茶道。茶道的精神支柱是禅思想。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从寺庙传到民间的，包括饮食及其规矩。神道本来是原始宗教，自然崇拜，弄得有模有样的历史并不长。明治以来，佛寺和神社分得很清楚，据统计，神社比佛寺多。很多日本人说不信什么，有神敬神，有佛拜佛。过年时哪个离家近，就去找哪个。

>> 日本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

齐鲁晚报：您的文章多写日本，但是写自己的方面比较少。与旅游者不同，您在日本是“讨生活”的，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吧？

李长声：在哪里讨生活都难。没有钱是最大的窘境，打工，挣来钱就化解了。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，不挑食，不大有什么不适应。

齐鲁晚报：提到日本，总也绕不过日本制造和工匠精神，尤其是在汽车和高科技产品方面，前些年日产的马桶盖被国人追捧，这些都是“日本第一”信条的主要支撑。您认为，在哪些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制造借鉴？

李长声：敬业，凭良心，对得起工资，干好本职工作。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些。日本制造走向世界也是有

一个过程的。买马桶盖，可能因为中国没有，也可能日本质量好，或者便宜，无可厚非。歌手麦当娜也买过。但买的人多，就壮观了，引人注目。

齐鲁晚报：近期日本队在世界杯表现得很可圈可点，给亚洲足球挣回了不少脸面。还有日本球迷在球场捡垃圾的照片，有人认为这得益于日本的教育体制，是这样吗？

李长声：日本足球是日本的事，跟亚洲没关系，不要与有荣焉。日本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。对教育的重视，中国现在也不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时候。

齐鲁晚报：周作人写到，“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，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，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，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。”当

然，也有一部分中国人有“哈日”的倾向，您又是如何理解这两种极端观点的？

李长声：自大心是“中国人原有的”，即使能够把它抑制住，平心静气也只是“略为”，周作人这话说回家了。大概崇洋媚外才没有自大心吧。电视剧里演的那些汉奸也不会有。哈日也没什么不对，只是不要走极端。

齐鲁晚报：在《两千年友好的神话》一文中，您以“渡边劫波兄弟在，中日豆腐很好吃”作结尾。作为一个侨居日本30年的“知日派”，您理想中的中日关系是什么样子的？

李长声：中日两国理想的关系是相安无事。双方要努力少管对方的事。